

柔石日记



赵帝江 姚锡佩 编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陈漱渝 李文儒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柔石日记

赵帝江 姚锡佩 编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1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440-1166-6
G·1167 定价:11.50 元



柔石像(192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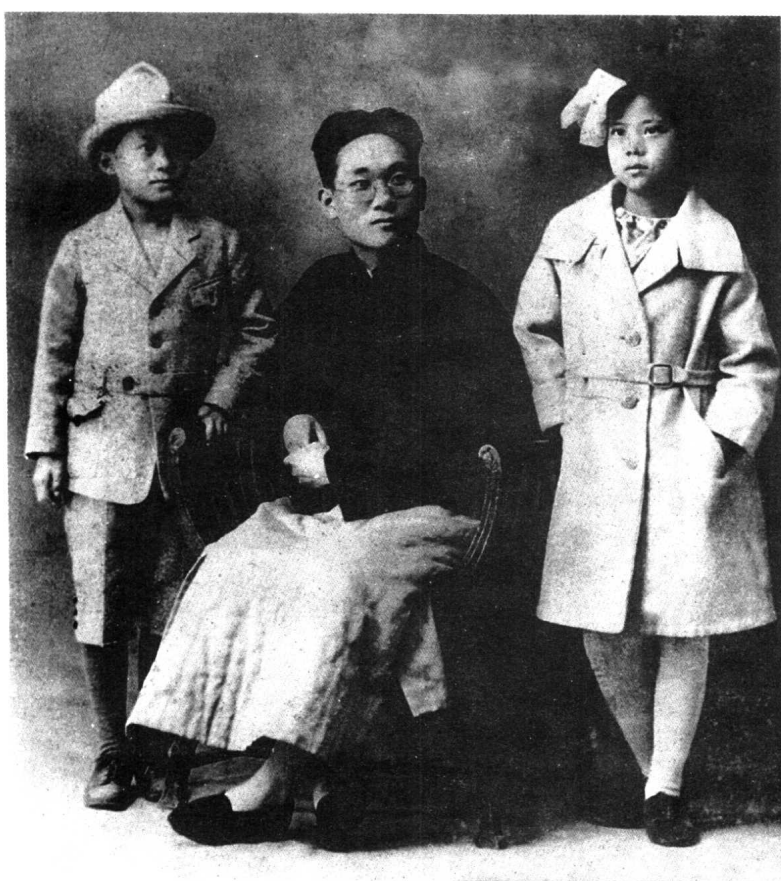
LAR 58/05



宁海柔石故居的卧室
兼工作室



毕业照(1923年)



1923 年与学
生——应家姐
弟合影
(原题：生命
中的一刹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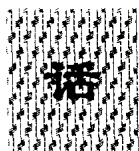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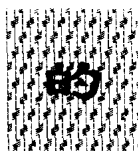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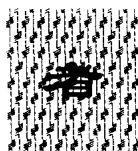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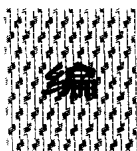
1926 年留影
(原题：上海龙华娘娘宫前摄
影，时丙寅清明前一日 摄
者柴时遴君)



原題：一九二八年十月，時年廿七歲友福煦君（孫伏園之弟）攝于滬。

柔石日記手迹
之一（1929年12
月22日）

好幾次，我感覺到自己底心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不寧，也不知爲什麼。可是，在周先生家裡談了話，就平靜的多了。三先生的一種科學家的態度和教誨，很可以使我底神經質的空氣的面貌，感到漸漸地底用生動的精神，清晰的思想，博學的知識，有理論的講解，都使我感到慚愧。而魯迅先生底底仁的寬裕，滑稽的對社會的嘲笑，深刻的批評，更使我深覺而增加知識。今天以後，他留給我一個教子，有趣的教子，學如人底心理的：



用“言为心声”描述日记的文体特征,大概是最为恰当的。

除了写作时就想着要发表或为了发表而写作之外,一般来说,日记是作者的心灵私语——写自己,自己写,写给自己看。凡记日记者,下笔之时,大约极少顾及或顾忌所记所写的社会效果。事实上,大部分日记,很可能作者是唯一的读者,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读者限定在极小的圈子内。

因此,日记堪称最大意义上的个性化写作。它的最大特点便是一个“真”字:关于自我的实事,真情,实感。

向内的自我回溯也好,向外的人我之间的交流也罢,贵在一个“真”字,也难得一个“真”字。就因这个“真”,日记便有了区别于其它文体的特殊魅力。

况且,作为作家,作为文化人,作为有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因其知识结构和生存方式的缘故,更具有敏感、多思的特点,具有自我意识、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较为强烈的特点。面对同样的人或事,所感所思往往比一般人要多,细,远,深。所以,作为文化人的作家,他们的日记的内涵便格外丰富,情思细微,意味深远。

至于中国现代作家,他们身为文化名人,参与社会、干预社会的时期,正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巨变,思想革新,学术文化演进,风俗习惯移易等,无疑在现代作家的日记中会有直接的反映或间接的折射。现代作家的日记也就具有了中国历史转型期的记录与见证的史料价值,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的价值,并因其视角独特、不可多得而弥足珍贵。

现代作家个性鲜明,自成一家,卓尔不群,以大气度、大手笔写日记,自会显得不事修饰,无意加工提炼,但却具有简约质朴、天然浑成的本色。落笔行文,超然于创作著述的规范之外,一任生命之泉自然流淌,或洋洋洒洒,或两语三言,其聪慧,其机敏,其修养,其学识,其才气,其情性,尽在字里行间,言语有尽而意味无穷。

朱光潜在一篇题为《日记》的文章中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都是人,了解人性是人性中一个最强烈的要求,我们都有浓厚的好奇心要窥探自己的深心的秘密和旁人的深心的秘密。在要求了解之中,我们博取同情也寄予同情。我们惊喜发见旁人与自己有许多相同,也有许多不同。这世界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却也不是一个陈腐单调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记日记与读日记都永远是一件有趣的事。”

翻检现代作家日记的些许感触,成为触发我们编辑这套《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的由头——美妙而难得的阅读体验,总愿与同好共享。

本丛书的编辑,注意到以下几点:

一、入选范围为我国现代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知名作家或文化名人。

二、从作家及文化名人留存于世的日记中选择文化价值大、可读性较强的部分,按时间顺序编辑成册。

三、尽量保持日记原貌,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对个别不符合规范的文字、标点做必要的技术性处理。

四、注释以少而精为原则,主要解决难度较大的阅读障碍。

五、每册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前言,总论本册作者的日记概貌及其特色与价值,偏重于学术性,以供读者参考。

前 言

姚锡佩

柔石，本姓赵，名平福，后改名平复，又名少雄，笔名有金桥、刘志清、赵璜、方前等。1902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市门头一个小商人家庭。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政府残酷地杀害，是中国现代文坛上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在人间只生活了短短的二十九年，然而，他的英名已深深地镌刻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墓碑上，时时唤起人们的记忆；他倾其心力描述的那一时代人之苦闷和觉醒的文字，更在六十余年的风霜雨雪中，炼为不朽的化石和精灵，永存浩渺的宇宙间，时时迸发出生命的火花。

柔石的精神，不仅反映在他生前已发表的近55万字的创作和约63万字的译作中，而且也蕴含在他未及发表的近22万字的手稿中。

诚然，在柔石生前，已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地位。他的创作业绩也早有定评。他最初署名柔石发表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即由鲁迅以“优秀之作”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鲁

迅更赞赏他的中篇小说《二月》，以“工妙的技术”，刻画了“近代青年中的这样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悠悠的岁月，业已证明《二月》的艺术生命力：它被改编为戏剧、电影等多种文艺形式，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国外，已被译为英、德、法、印地、泰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小说之一。

如果说，《二月》尚囿于作者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和情感，那末，继后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所反映的当时中国存在的“典妻”现象，则被视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资料”而受到国内外的瞩目。它不仅被收入蒋光慈编的《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中，而且分别收入1934年英国伦敦马丁·劳伦斯书店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和1936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编撰的《活的中国》。当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国际文学》法文版读到小说的译文后，即写信告编辑部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它充分显示了中国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实绩，也标志着柔石创作风格之底蕴，更加丰富深厚，在固有的缠绵细腻、逶迤多姿的技巧下，更多地呈现出他那淳朴、深沉的精神气质。这一精神也反映在他同一时期创作的散文中。如以《人间杂记》为题创作的14篇随笔，用漫画笔法勾勒了老中国人的生态和病情，他尤其深切地关注和忧虑那些备受摧残的穷苦儿童的悲惨命运。正是由于这些作品对社会黑暗面的深刻揭露及其产生的影响，因此当柔石把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以《希望》为题结集出版时，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禁止乃至焚毁。

然而，已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柔石，面对反动势力的迫害，更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创作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当他作为“左联”代表，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与战斗在第一线的工农代表生活在一起时，他第一次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深刻的思想影

响，鲜明地反映在他写的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印象》中。尽管这篇报告存在着当时党内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某些影响，但他热情描写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发轫时期，播下了富有启迪意义的种子。这篇具有文献价值的报告文学，次年即被译为日文，收入尾崎秀实、山上正义（林守仁）编译的《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一书中。

为什么柔石的创作思想、内容及其艺术风格，在短短几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并迅速成熟？为什么极少存在当时一般“左翼作家”所常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显然，这又与他个人的思想本质、生活际遇有关。因此，他的遗物，特别是他那具有独特个性的日记，备受人们的关注，为研究烈士的生平、思想、创作及其发展的脉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柔石遗存的日记，在数量上并不多，只有近十万字，且因其原非逐日记载，又年久失存，故残缺不全。尽管它只是反映了1922—1925年、1928—1929年这6年的某些生活片断，却以其特有的内容和形式，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首先，柔石日记的独特性，乃出自他个人对生命的急迫感。1922年5月21日，是他现存最早的、题为《逝影》的日记本中的第一天，他写道：自己“已经到开花期和结果期了。假如再不想想，以后的生命也无用继续。但是第一事，还是自我努力罢！”诚然，那时他已度过了20个春秋，且在父母之命下，已结婚一年多了，这也就意味着到了中国男子准备独自成家立业的时候。然而，事业在哪里呢？柔石不想走小镇青年惯走的固守家业的老路，他渴望生命开出新的花朵，因此更加速他关心诸种人生的问题。而这一渴求，正是他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三年中获取的思想。他已不是刚入校时那个“拼命读书，弄得两眼非

常近视”，只想做一个“学问家”的幼稚学子了；也不再满足于课余个人的琴棋书画生活。他开始由个人走向集体，在上一年5月22日，他发起组织“宁海旅杭同学会”，并由他主编出版月刊，反对宁海的封建势力。同年，他又参加了浙师同学潘漠华、冯雪峰等发起组织的“晨光文学社”，自觉地参加到新文学运动的行列中去。正是在这思想的流动和追求中，他很自然地形成了自己日记的格式：并非是流水账式地录下日常生活，而是旨在解剖自我和周围的人生。因此，解剖和探讨，成为柔石日记的第一特性。

其二，柔石日记产生于中国的20年代，这是一个封建军阀盘踞政坛，复辟势力甚嚣尘上，新旧思想浑沌和较量的时代，个性解放的要求和封建思想的禁锢，不时造成人生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从日记中可见柔石当时深受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使本性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情感，而在思想、经济、择业乃至婚姻爱情上处处受人掣肘的柔石，处于强烈的“精神界不安”的状态下。他无处倾诉，只能“将我的没趣，告诉我的纸”。这就形成了柔石日记“倾诉衷肠式”的“抒情性”。他时而沉浸在幻梦中百无聊赖，时而奋力呼喊：“去，不能倦了……”他在1922年5月29日写道：“哭，无论如何是没效的。要模仿肩膀上荷着锄望田中去的农民，或手里执着锤看着铁打下去的工匠才好。”同月24日、28日写的无题小诗，也可说是他留下的最早的抒情诗句。

其三，从现存的柔石日记来看，有的片断乃有意锻炼自己的观察力和描写力。如1922年6月16日续记五天前的泛舟之行；次年4月11日补记6日的游湘湖。在这些片断中，他不仅致力于写景，而且重在捕捉人生百态。如1924年2月9日记15年前的五个小朋友的不同人生道路；同年7月6日记游西辕岭摘杨梅时途遇丐妇的人物描写和对话。这些生活素描为他日后的文学创

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如1923年1月5日记返乡时火车上的见闻，寥寥几笔，颇为生动地速写了上下车旅客异样匆忙的神色，其中有老者、幼者，更突出地描绘一个抱着孩子，低着头，含着泪珠的中年妇人，写道：“我也猜不出她的白髻心是何用意。究竟，一形一色，都显出人类的凄惨来！”每读到这里，都不由人想起他后来在《二月》中塑造的年轻寡妇的形象。日记中的不少内容，后来也确实经润色后作为小说发表。如收在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疯人》中的《无聊的谈话》、《爱的隔膜》，其原形即1923年11月16日、1924年1月14日的日记内容，两相对照，即可见他早年创作的生活源泉和精心的积累。

三

自然，在柔石日记中，对自我和人生的解剖、抒情和描写，都立足于纪实的基础上，这样，也就相当具体、丰富地为后人留下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真面貌。如1922年8月6、7日对家乡大水灾的纪实；1923年3月27日所记载的一个月来所经历的诸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其中尤使他难以承受的是浙师同学中毒的大惨剧，日记记录了事发后学校“死灰色的气象”和为死难的22位同学和二差夫所开的追悼会，留下了现代教育史上令人不忍目睹的一幕。在日记中，他也无遮拦地描绘了生活中的个人隐私，包括自己对性爱的渴求；十分真实地暴露了自己在夫妻感情上因精神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爱的隔膜，和双方为消弭两者的差距而各自作出的努力，以及其间产生的种种生理上、心理上的苦恼。记叙富有生活情趣，人物语言率真，心绪直露，逼真地反映了他自己和周围人的心态，毫不雕琢地留下了那一时代社会家庭的生活情状。

日记也真实地反映了作者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修养及其成长过程。他早期对人生的解剖和情感的抒发，基本上是站在个性主

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如1922年5月22日对于周围人及自己被视作“狂人”这一现象的解剖，仅执着于我行我素的意志准则；1923年日记中曾多次对人类的“兽性”予以剖析，并表达了极大的愤恨之情，然而也只是停留在“社会杀人”这一结论上。他也曾寄希望于教育救国，但个人的志趣和现实的黑暗，又使他常常徘徊于死和生之间，在动摇和自强中，展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内心的激烈斗争。在北京，他目睹了热血沸腾的国民支援“五卅”运动的社会斗争，因此更强烈地谴责自己依然徘徊于个人的得失中，没有“国家的观念”，没有一分“国民的责任”。尽管那时他的思想依然偏信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然而，因了这种不断严肃的自我解剖和自我努力，坚定了他创造新的人生的追求。在他投身于当时思想文化斗争的中心上海后，面对更严酷的社会斗争，他有幸得遇鲁迅这样的良师益友，思想愈来愈清晰、敏锐。如在1928年12月23日记下的他和鲁迅的谈话内容，当谈到“中国人素来没有信仰”这一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抓住了个人主义的要害，即在“没有信仰，只是‘要个人能活下去就是’”，“中国革命之失败，就在这一点”。他由此观察他周围那些讲革命、搞文学的朋友们，醒悟到他们的弱点也在于他们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去革命，“于文学，只说卖钱。一边他们信他们自己是天才，一边又不肯去坚毅地做”，只是在作品中热衷于空喊革命口号，增加所谓的“现代味”。对朋友的思想批判，正是对自己的鞭策。他甘愿花费全部精力去创造，所以他的作品，非但没有公式化、概念化的通病，而且还能时时创新。他正是以自己的忠厚、务实精神和创作实绩，成为“左联”的“基本构成员”。1930年5月，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实际革命斗争中，他也能比较自觉地去抵制某些“左”的决议，如冯雪峰曾回忆说：在“文总”开会决议开除郁达夫这件事上，只有4票反对，柔石即其一。

“想一想！决定！做去！”“为了救人，为了社会的光明，为了大多数的幸福，应当，应当，我应当这样做！吃苦！”“鲁迅先生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了，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柔石在日记中记下这些话，犹如座右铭，激励着他去取得文学创作上的丰硕成果。诚如鲁迅所言，他有一股“台州式的硬气”，凡决定投身的事业，他是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日记也留下了他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思想轨迹。

但正如他在1929年1月19日的日记中自我剖析说：“朋友已说我现在能这样恬淡静默做人，和以前的多感，烦恼，处处发现情愫的冲动，已相差很远了。但我的心，火焚的内心，谁知道！”是的，通观柔石日记，我们时时可看到一颗火焚的内心。这也就是他后来因王明在中共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贯彻比李立三更加“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他起而积极参与反对的原因吧。令人至为痛惜的是，他因叛徒的出卖而英年早逝。

当我们重读这些半个世纪前写下的日记，我们将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鲁迅的悲愤之言：“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四

现存的柔石日记，最早的系作者亲订成的三册（原为四册，佚第三册），封面都有作者亲书的册题和日期。其他日记或写于散页，或记于一本，均未编订命名。今由编者按现存状况，依时间顺序标题，分为六个时期：

1. 第一册，题《逝影》，1922年5月21日至同年12月7日。

2. 第二册，亦题《逝影》，1922年12月24日至1923年6月22日。

以上两册日记比较完整，记载了作者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前后，在“五四”以后的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对未来的渴求、迷惘和苦闷；也记录了他在假期返乡时的所见所闻，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军阀的强烈不满，以及对现实的极度失望。

3. 第四册，题《从心所欲》，1923年11月16日至1924年2月9日。实际上只有七天的记载，而且有着明显的习作痕迹。除前文所说的《无聊的谈话》和《爱的隔膜》，这两篇已发表的小说脱胎于日记外，还有一篇未印行的小说《课妻》，其雏形即1924年1月3日的日记。

4. 慈溪时期，1924年3月2日至7月11日。原无题。记任教于慈溪普迪小学时的生活。

5. 北京时期，1925年9月9、10日及15日。原无题。现存的三天日记，表达了一个只能在北京大学旁听的穷大学生对如何“做人”的思索。在“五卅”运动中，他开始省悟到个人命运和国家兴亡的关系。

6. 上海时期，1928年12月23日至1929年12月22日。原无题。日记时断时续，1929年2月9日前记在一些零散的纸上；1929年9月13日至11月30日，记于一本；另一本仅记了1929年12月22日这一天的日记。这部分日记，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文字语言，都有飞跃的进步。

柔石日记曾分别选刊于1987年《新文学史料》二、三、四辑及1980年《鲁迅研究资料》（第七辑）。本书系第一次完整地发表现存的全部日记。

五

为了使读者更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柔石的生平和思想，特此附录了作者二篇自传体作品和现存的全部柔石的书信，包括家书

15 封和致友人信 13 封，以及其亲友回忆柔石的文字。

本书收录的日记、书信，均经过六十余年的收藏，纸张大抵黄脆，有几处且残破不堪，字迹难以辨认；文字上也有衍文、脱漏等情况。书信则有的未署日期，或无任何落款。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本书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记和书信重新考订和注释。体例如下：

1. 凡肯定是脱漏，下加〔 〕；凡肯定是衍文，下加〈 〉，并将脱字、衍文注于〔 〕〈 〉中。凡残字，用□标出，凡因残破而无法确知残几字者，用省略号标出。
2. 凡属异体字和明显的错字，一律改为通行字或正字；不规范的标点符号也一应规范，不再注明。
3. 书信部分以考订后的时间次序排列，农历一律换算成公历，补写的落款文字，均以〔 〕标出。

本书整理编排或有不完善处，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1996 年 8 月